

略论近现代边疆行记的文体特质及语义内涵^①

赵顺宏 孙嘉慧



【摘要】 由于文学观念的变迁,近现代边疆行记是一个被忽略的重要文学现象。重新梳理、认识这一文学现象,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这一特别文类的来龙去脉、古今变化,也可以更好地把握其文体特质和语义内涵,与此同时,还可以深化我们对“天下王朝”向“民族国家”历史转变的理解,深化我们对其中“自我”与“国家”间“群己关系”的认知,进而深化我们对边地文学审美发生的理解。

【关键词】 边疆行记;文体特质;语义内涵

在近现代文学发展和转变过程中,由于文学观念的变迁,有些文类长时间遭到忽视乃至湮没,如现代作家的古体诗词、数量庞大的通俗小说,以及散文方面的域外游记和边疆行记等。近年来,借助对文学观念的反思,学术界对现代作家的古体诗词、现代语境中的通俗小说及散文创作中的域外游记等都有所倾力。这些文类的研究反过来又加深了人们对古今文体演变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知。边疆行记作为一种纪实类散文文体,在近现代历史文化进程中曾产生巨大的影响。孙中山曾为谢彬的《新疆游记》作序,鲁迅曾在《东方杂志》上为徐旭生的西行科考日记提前预约评论,艾芜的《南行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也产生过巨大的文学和社会影响。与此同时,茅盾、刘半农、郑振铎等现代作家的西行也是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对近现代边疆行记这一文类的忽视,不仅影响我们对古今文体转变的认识,还影响到对“天下王朝”向“民族国家”历史转变的理解,影响到我们对其中“自我”与“国家”间“群己关系”的认识,甚而影响到对相关潜在文体样式和审美形态的感知与把握。因此,梳理其发展轨迹,把握其文化内涵和精神脉络,进而透视与其紧密相关的边地文学在审美上的渊源,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必要的。

^① 本文系 2020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融汇视野中的当代汉语边地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0BZW1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文体演变进程中的近现代边疆行记

从概念上说,边疆行记这类文本在古代的称谓并不统一,但以“行记”命名者较多,如宋云的《宋云行记》、倭仁的《莎车行记》等。另一些作品虽不以“行记”相称,但“行记”的内涵也相当明显,如明代陈诚的《西域行程记》、清代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等。清末民初的裴景福因事被谪戍新疆,沿途录记见闻,著成《河海昆仑录》一部。他在书中提及所参考的前代同类作品,即以“行记”加以囊括:“余西行万里,地名里数,多采之土人、役夫,而荒村野店,已见昔人行记者,颇兴废不一……”(裴景福,2016:280)近现代以来,此类作品颇具声势,但大体不离“行记”这一轴心,如陈万里的《西行日记》、李孤帆的《西行杂记》、范长江的《塞上行》等。其中,一些作品以游记相称,如谢彬的《新疆游记》、张恨水的《西游小记》,但这里的“游记”主要侧重“游历记录”,因而,从本质上它们也是“行记”类作品。

“行记”与“游记”虽然有重叠,但却有着不同的文学特质。游记与行记都涉及自然景观,并且都有一个演进过程,它们有时会彼此重合而交叉使用,似乎并无障碍。但事实上,它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游记与行记在对象上、旨趣上和表达风格上都有所不同:行记注重记录行旅过程,“行记的着重点本在于记‘行’,以‘行’为叙述对象和基本内容”(李德辉,2003),游记主要描绘人文或自然景观,“写景抒情之作,一向是游记文学的正宗”(钱谷融,1986);行记重在行旅过程中各种综合信息,而游记偏重作者的情绪和感受;行记偏向于写实,语言简洁不重修饰;游记则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或修辞风格。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不太长的时间段里,可以看到,边疆行记类书写文本呈现出一种沛然而兴的态势。从清末民初《河海昆仑录》《西征续录》《北草地旅行记》等预感时代的巨变,到新文化运动前后《新疆游记》《西北考察日记》《西游日记》基于新的文化观念对边疆历史文化状况的考察,再到抗日战争前后危难时局中《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中国的西北角》对边地民族、社会的实地访查,可以说,边疆行记以独特的视角感知历史巨变的脉搏,表达对民族、文化与历史未来的忧思。

从上述各时段的不同表现,我们就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这些作品的产生有其鲜明时代因素的推动。但是,若放到一个更远的视野中来考察,则可发现:这一时期边疆行记的大量出现还受到2种文化思潮的推动:一是清代中晚期以来西北史地研究热;二是19世纪末期开始的西北探险热。上述2种思潮本身包含大量的行记作品,前者如祁韵士的《西域见闻录》、徐松的《西域水道记》、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等,后者如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伯希和的《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等。在这些思潮的推动下,人们对边疆的地理与文化认知和理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上述边疆行记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毋庸置疑,而其承载的行记主体在特异地域环境中的人生感受和其审美价值似乎也值得关注。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相关的评价和研究却相当稀少,更惶论在文学史中寻找恰当的位置了。何以如此?其中比较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到文学观念的遮蔽。就是说,在文学史新旧交替的历史时节,只有那些最能体现新的文学观念的创作才受到人们更多的评判和讨论,比如,现代的白话小说、白话体的自由诗、现代的话剧等;与此同时,那些较为传统的文体样式容易被人们忽视。相对而言,散文便是这样的一类文体样式。尽管新文学运动后的散文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鲁迅所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1981:576)但散文这一文类长时期里没有引起人们热切的关注。一旦有所讨论,往往也是与“美文”“小品文”“抒情散文”“文化散文”这样一些现代散文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像鲁迅这样新文学的旗手也不免有些苦恼。鲁迅的杂文不受文坛的待见,除了思想的抵触,应该说也存在着文学观念上的隔阂。鲁迅曾说:“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做Tsa-wen的东西……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写起来,于大家有益。”(鲁迅,1981:291)

在一种文学突变时期,人们更关注其变化性的一面,更多地分析和讨论这变化性的一面,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尘埃落定的历史背景下,在重返文学现场的远距离历史视镜之中,我们自然可以看到更多的历史细节,勘察更多的历史层面,从而以更清醒、更客观的态度来理解和看待这种文学的转变。在这种文学视野中,我们既需要看到其前后的跨越,也应该看到其左右的移动;既需要看到其变化的一面,也应该看到其承续性的一面;既需要关注那些突变性的现象,也应该辨析那些隐蔽的文学潜流。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文学观念的新旧来裁断作品,而是应该从深刻的主客体审美关系中体察“非这样写不可”的心路与文脉。我们理解鲁迅的杂文如此,理解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类也是如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边疆行记这一文体就是那种处于边缘位置的文学潜流。它本身处于传统散文这一巨大门类的一个狭小角落之中,在传统散文这一大家族中它的身份本不显赫,在文学新旧转变这一历史背景中更是难以引人注目。所以说,它长时间地消隐于人们的视野之中,本来也并不足为奇;但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一文体样式联系着“天下王朝”到“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变,联系着与之相关的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和越来越明晰的边疆实地经验,甚至还联系着此后边地文学的兴起,那么,深入理解这一文体并重勘此一文体特质就显得十分必要。

对于文体的认知,既有四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现代文体观念,也有深厚的传统文体观,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人们似乎一直在

进行着各种文体的归类。当然,归类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对文体进行辨别。或者说,这两者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蕴含着在异同比较中进行归类处理的思路。一旦将文本归诸某一大类,就出现了文体的流变问题,就需要通过辨析源头察其流变来把握一种文体的兴衰、演变。在这些方面,古代文论中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可资参证的经验。

对于文体而言,寻找源头和分析演变是同等重要的 2 件事。寻找一种文体的源头就是要找到这种文体的原初基本形态、基本结构及其形态基因。边疆行记这一文体样式如果从原始文本来讲,恐怕应该是当年张骞、班勇等出使西域时的一些记录。这些记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还有曲折的反映。如果说,源头不一定完全由时间维度界定,那么,《大唐西域记》这样的文本也可以看作是行记的源头型作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边疆行记的基本形态。一种逐步展开的行程记,以及相伴而生的山川道里、民俗物产、异域见闻等内容。在这里,地理空间的逐步打开是行记的最基本构架,山川物产、异域见闻是随着这些空间的不断打开而打开的。所以,最早的行记文本被辑录在古代的地理书之中,这或许也不是偶然的。与诸多文体发展中的一般规律类似,行记这一文体也经历了从早期基本形态演变为后来丰富形态的过程。自汉代行记的初步发生,到唐宋行记的初步繁荣,行记文体上有进一步的滋育分化,如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把唐宋行记因所涉地理空间的不同分为朝聘、行役、蛮夷三大类型,但总体来看,这些发展仍属于行记文体的古代形态。这类行记结构相对简略,行文简洁、不枝不蔓。到清末民初之际,边疆行记在结构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明显膨化现象:出现了插入的议论、感想;出现了与行程相关或不相关的古体诗歌;出现了比较复杂的山水描写;出现了较为深入的异域风情介绍等。这些感想、议论,可能是有关行程中所遇到的现象,也可能是读书的所思所感,也可能是让人挂心的国家大事等。其所作的描写、叙述,可能是对眼前景象的即兴记录,也可能是对相关文献的深度整合。总之,行记由原来骨骼式的基本结构膨化为一个富于包容性的综合结构。

从行记文体结构的膨化也可以感知其表达方式的转变趋势,概括地说,是由文章体表达逐步转向随笔体表达。所谓文章体,这里并不是就其总称而言,而是就其规范性、简洁性而言,主要指那种严谨、规范的学术风格。古代行记在表达上呈现为相当规范的样式,比如,把清代林则徐的《荷戈纪程》与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略作比较,可以发现叙述视角、叙写方式,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从视角上看,都是单一的行记主体的叙事视角,主要局限于外部视野,基本没有内部视野的参与,中间没有任何其他视角的参与,没有因此出现转换或岔开之类。从叙写方式上看,主要是以叙述和描述两种方式展开,体现为“我”对所经历对象的传导,基本没有其他经验或对象的介入。从语言文字表达上看,语言是平实、质直的,没有过多自我情绪流露其间,也没有疑问、感叹、夸张等修饰。

以此对照近现代边疆行记,则会发现其文体表达上的鲜明变化。在叙事视角上,虽仍以行记主体的角度展开,但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经常在行程中或多或少插入其他人物的活动和叙述,这使得原来相对纯净的行记文体显得驳杂起来,像《河海昆仑录》中除了行程中身边相随的人物之外,还有路途中交往的人物,他们的言谈举止往往也渗入文本中来;另一方面,就行记主体相关的表述而言,不再局限于视野外部,而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表达对社会、人生或自我的深刻感悟。“余弱岁即堕文字障,性不耐闲,所为皆无益事,近年猝撻忧患,亦仅一身一家之祸福,别无关系,蒲柳之姿,何遂望秋先零耶?”(裴景福《河海昆仑录》)这是作者西行到达兰州身患小恙时对自己人生遭际的体味与反思。这与古代行记偏向质实的表达特质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体现了内部视野的参与。由此而来,叙写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出现变化也就再自然不过了。仍然以《河海昆仑录》为例,可以看到与此前行记的文章式表达相比,它明显呈现出一种随笔式的表达。其叙述的转换、描写的笔法,都显得多彩多姿。从道德文章的修养上,作者原本该是严谨克制的,但他明确意识到了基于个人性情的表达需求。比如,他在途中感慨自己与李白、韩愈、苏东坡有相似的仕途贬谪命运,“夜郎、潮州、儋耳,不如西域荒远,而太白、昌黎、东坡得之,便发抒光怪,以为平生奇遇,自余视之,三君子中尚少一段此奇境”(裴景福,2016:189)。明显觉得自己远戍西域大荒的体验为前人所难有。此意念自然也会传导于语言表达上,其风格便有明显的不同,如作者描写进入头水沟时的情形:“天山西来二千余里,势如奔马,至此中断,划为深壑,横穿山腹一百四五十里,可谓奇矣……二十里悬溜峭壁,两崖相嵌,石各异态,有细纹如牛毛长皴如披麻者;有大石上覆,碎石如鳞甲者;有层叠如砌者;有方整如块者;有斜欹如堆酥,赤立如斧劈者;有上突下空如覆屋者;有方平如砥可坐千人者;有孤插如笋者;有如带剑披甲者;有如端拱而冕旒下垂者;有如武夫持戈互斗者;有如美人互相偎抱者;有如奇鬼怒搏者;有如覆钟卧鼓鼎立釜仰者。入峡愈深,石愈大,峰愈幻,车亦愈簸,一石一状,数石攒成一峰,而一峰极一峰之变……行五十里后,天白颗颗,雪花飞洒,阴壑生寒,重裘不能御,其间必有异人结茅趺坐、羽化登仙者。距头水沟约四里许,峡内有涧水,阔三丈,长二十余丈,积水甚深,层冰未解。入夜大风雪,官店宽敞整洁,桌椅俱全,为关外冠。佛说:旅泊之人,赐与华屋,虽不能久居,亦快事也。”(裴景福,2016:268)

我们除了从结构及表达等方面来具体分析一种文体的特质外,有时也从功用上来加以感受和把握。就此而言,近现代边疆行记相较于古代行记,既有其延续性的一面,也有其延伸与拓展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求实(实用)与审美的权衡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古代行记是以求实录的史学品格为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在写作过程中,“求实”是其主要的追求。范曄称班勇的《西域传》“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范曄《后汉书》)。辩机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是“务从实录,进诚皇极”。

大多情况下,它们也多被收录于史学著作中得以流传。应当说,写实本身并不碍于审美,同样可以在写实的基础上达到传神的审美境界。比如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史学著作同样是不朽的文学名著。但若拘泥于史实材料自身,自然会影响表达的升华,限制表达审美的提升。这也是古代行记质朴无华、本色当行的主要原因。

近现代边疆行记明显延续了这种写实求真的品格。近代的《河海昆仑录》《辛卯侍行记》等,行程实录是其核心架构与内容。现代伊始,从林竞的《西北考察日记》、刘文海的《西行见闻录》、马鹤天的《甘青藏边区考察日记》,到《西行日记》(陈万里)、《西游日记》(徐炳昶)、《蒙新考察日记》(黄文弼)、《西北的剖面》(杨钟健)也仍然如此。如果说前者带有对西部边疆社会文化状况考察的实际目的,那么,可以说,后者则带有对此一区域历史古迹、地理环境、气候水文等方面进行科学考察的实际目的。可以说,行记发展到这一阶段,其实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内容多样性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而在实用性进一步延伸的同时,近现代行记的审美属性同样也有所发展,行记主体的活力明显增强。行记文本叙写的不仅仅是行程中的山川道里、风俗民情,还包括行记主体的各种活动、社会考察、科学考察、文化调查等。更为重要的是,伴随这一复杂过程,行记主体产生了相应的更为丰富的社会人生感受,既可能是异域环境触景生情的情绪感发,也可能是现实问题的深刻触动,还可能是有关历史和文化层面的深思与忧思。实用性与审美性从分析的角度来说或许各有侧重,但在行记的叙述中却是浑然一体、相互融合的。正是这种纠葛、融汇,催生了新的审美契机,体现了对人生景象乃至历史存在的新感知和新体味。《河海昆仑录》中,作者在西北边陲,对茫茫河海昆仑的探查、对历史深刻转变的感知与对自身坎坷命运的意会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浑茫沉雄的美学境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带有一种新闻叙事的畅快,不仅因为相关篇什要见诸报端,更因为作者对边地世界已经形成比较鲜明、明快的美学表达。例如,他在白水江上源一带遇到运粮的藏族人民,对藏族女子做了这样的议论:“女子装束甚简,赤足,短围裙(粗土布为之),粗土布单衣,袒胸,发束为十余条小辫,披于颈后,表现十足之天然美!盖女人美的条件,以近代观点言之,为黑发,大眼,黑瞳,挺胸,大臀,健腿,天足,且须姿态自然。藏女因生长蛮荒,终日爬山越岭,受充分日光、水、空气之陶养,加以长期之劳动,故体力充实,举动捷活,十足的具备近代美之要件。如只以外观美而言,若干藏女,其美丽远在沿海都市上所谓‘明星’‘皇后’之上。凡自沿江沿海都市来此之朋友,几无不为藏女之纯美所惊倒。”(范长江,1980:31)这种对原始野性美的把握,并不是个人偏好的表达,而是要经过一系列审美观念的孕育与转换才能实现。

2. 近现代边疆行记的语义内涵

这些近现代边疆行记,个别来看,不外是行记主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有关的行程记录,但若从整体来看,不难察觉行记视野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从中可以看到,边疆从荒远的流放之所逐步转变为近前的忧患之地。这种转变也同时表明,行记视野不仅关联着外部场景,更在这一种“看”的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语义内涵。只有把行程中的“场景”和“语义”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和解读行记视野的历史性变化。因而,还有必要从更细致、具体的方面来辨析和看待这种关联。大致说来,这种关联主要体现为3个方面:既往性与即时性的关联,在场性与非在场性的关联,杂多性与单一性的关联。

其一,既往性与即时性的关联。近现代边疆行记体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时间性特征。如果说古代行记也偶见时间性特征,如明代陈诚《西域行程记》就是以时间线索展开的,但总体上看,古代行记的时间线索并不显著,更主要是通过空间展开来体现时间顺序。近现代边疆行记越来越强的时间性就体现在其即时性的时间展开,时间成为行记过程展开的醒目标记。时间成为此时何时、此时何处、此时何为的引线,这使得整个文本打上了一种即时性的烙印。但我们又可以明确感受到,这些行记文本在即时性展开中又总是不断卷入和交织着过往性,过往性总是在不断地召回和唤醒中浮现眼前。在某种程度上,行记就像是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人面对同一话题、相似场景的对话或交谈。因此,行记带有明显的和声复调意味。我们这里提及复调一词主要表示其不同声音的相互交织,主要是既往性与即时性的复交织。这与巴赫金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并非同一个意思,巴赫金所说的复调主要是价值的不确定性而导致人物意识上的争论性和论辩性,由此而构成其小说话语上的复调性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复调”的借用往往偏离了原来的意思,主要就多个声音同时出现、相互交织的状况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既往性与即时性的交织是具有这种话语特点的,所以我们也不妨称之为复调话语。

我们把这种既往性与即时性交织视为一种复调话语时,便会发现,这种话语既具有个体性品格,也具有时代性特征,时代性往往又借助个人性得以呈现。比如,像《辛卯侍行记》这样的作品,其中充满了大量的对前代文献的繁复征引,一个细小的地理细节、一个地名或典故,在辨析过程中,引证文献常达十数种乃至数十种之多,对相关文献大有竭泽而渔的架势。这种做法显然很大程度上受到乾嘉学派考据学的影响。后来,在徐炳昶的《西游日记》、黄文弼的《蒙新考察日记》、陈万里的《西行日记》等作品中,这种复调性的交织则又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风格。这些毕竟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科学和启蒙精神洗礼的作者,对前人的相关说法他们也会重视,

自然也会形成“既往性”与“即时性”的交织,但是,一切都要经过理性法庭的审视,这使得相关作品呈现出明显的求细、求实特征。比如《新疆游记》中,作者谢彬过永昌界时,经过一个叫十里八坝堡的地方,文中记曰:“堡东有阁当道,曰火祖楼,塑像皆作警形,不知何故,岂鬼神祸福无凭,而故以是诮之耶?”(谢彬,2016:49)陈万里经过此地时,专门去观察了这些塑像,并指出:“十里八坝堡,《新疆游记》所载堡东火祖楼塑像,均作警形,趋视之,未必然。其已改塑耶?抑记载仅凭耳食耶?二者必居其一矣。”(陈万里,2021:69)黄文弼在额济纳附近看到不断出现的烽墩,对此进行了考察,也查询了《通典》《汉书·匈奴传》等文献。他的疑问是,眼前这些土墩——在《通典》中也曾提到过的土墩,“与路氏所筑一乎?二乎?余以为一也”(黄文弼,2024:127)。这里说的是这些土墩与汉代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烽墩的土层结构来看,都显示它们是具有连续性的。这里面不仅包含着细致的猜想与推问,也包含着细密而扎实的验证。这样的例子在《蒙新考察日记》中比比皆是。比如,作者在居延索果诺尔获得一些石器,有打制的,有刨制的,由此推断,这个湖泊现在虽然是盐水的,周边无人居住,但说不定古时是淡水的;据此又佐以《蒙古游牧记》描绘的此湖情况“亦云人民沿湖而居”,“因此,余颇疑此湖古为淡水,后渐为盐水耳”(黄文弼,2024:135)。

前后略加比较便不难发现,晚清时期的《辛卯侍行记》等作品繁复的文献引证濡染了同一时期考据学的风习,作者的思绪往往聚焦在相关文献和证据本身。五四时期的科考行记虽然也有具体的科考目标,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有着重构古代生活状况的兴趣,即它并不局限于所涉证据本身,而是合理地延伸为对当地历史生活的想象性还原。总体而言,无论是对前人文献的大量引证,还是在引证基础上结合当地状况的进一步想象性延伸,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时间召回和唤醒的方式。这种既往性与即时性的关联使得作品的展开既有基本的线性特征,又呈现出丰富的内涵,带给作品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其二,在场性与非在场性的关联。在场性指此时此地的直接体验,它是行记主体对行记过程中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直接和感性体验。在这些边疆行记中,读者总会随着行记主体的行踪感受边疆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习俗等。这里有迥异于内地的塞外荒寒,裴景福在穿越巴里坤天山腹地的时候看到茅店荒废,井泉无水,“檐下狼矢皛皛,炕尘积灰存余”时,油然而生如此感想:“人生到此,不但穷通荣辱俱亡,即父母、昆弟、妻子、死生、聚散也漠然置之,做出世想,而道心生焉。”(裴景福,2016:271)再如范长江在翻越松潘大雪山时,既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震慑,也为生命之脆弱所惊觉,在这样生命的原始蛮荒之地,产生对生命之根本意义的遐思:“仰观满天星斗,耳听鸣风风声,极目向四面黑暗中侦察。此时心境旷逸,忽东忽西,深觉人生之平淡,所以终身奔劳不休者,特为生存之必要所驱使,并无特别之意义,故本于生存之必要而活动,此即为人生之真谛。”(范长江,1980:19)这里有令人

震撼的此情此景,这便是其在场性。但在在场性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种不在场性,这不在场性同样参与了此时此景的建构——前者提及的“穷通荣辱”的入世之念和摆脱凡尘的“出世”之想,后者则关乎“人生真谛(意义)”与“生存必须”之间关系的感受与揭示。这些“想法”“语义”都带有不在场的特点。正是这种不在场性的参与——不在场性与在场性的关联,使得整个视野变得丰富复杂、变幻莫测。

在场性与不在场性的关联可能以奇妙的方式发生,由此可以引发丰富的乃至奇异的语义变动。与此相关的视野和场景当然不胜枚举,但最著名的莫过于西行路上的“敦煌”。敦煌重见天日之前,比如在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1891年)中虽然有提及,但那似乎只是在历史烟尘中消失的远影;裴景福在《河海昆仑录》(1906年)中过玉门关时对敦煌只是略一提及,对此间所发生的惊天盗案以及由此打开的另一个古代世界,似乎仍杳然未闻。但是,对近20年之后途经此地的旅行者来说,情况就迥乎不同了。陈万里《西行日记》中,敦煌成为唯一的主角,它不仅是西行的目的地,也是在场与不在场关联的核心。这时的敦煌不仅是西行路上古老的关隘之城,也是旷世的文物大发现,是一种被风沙掩埋着的历史文明的再次面世。当然,与此相联系的不仅有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也有劫余的痛苦与缺憾。这一切构成了在场性与不在场性的复杂交织,并在复杂交织中不断地演绎与升华。

此一时期与边疆行记相关的大量场景被重新打开、重新解读,罗布泊也好,楼兰古国也好,传说中的“弱水”也好,“黑水”也好,具有宗教意味的百灵庙也好,但若与敦煌相比,这些场景瞬间就显得黯淡无光。围绕敦煌这一场景,在场与不在场的联结中充溢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仅就学术角度而言,从王国维的学术转向到陈寅恪的持续深入,与边疆行记相联系的历史文献及西北文化元素显得格外醒目。于此,陈寅恪曾有著名的“材料与问题”论说。此一论说看上去具有一般的学术方法论的意义,但实际上完全可以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这时,材料与敦煌的发现紧密相关,问题也是由此触发而延伸出来。这里,材料与问题的关系成为在场与不在场关联的一种特殊体现。在此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今的辉映、问题的凸显。而这种场景还原必然与边疆世界的更迭演变有关,与边疆行记也自然存在着内在关联。

其三,杂多性与单一性的关联。近现代边疆行记这一文类看似略显单调:它的人物显得单调,主要以行记主体作为主要人物;它的活动也显得单调,主要是朝向某一目标或缓或急的行程。因此,我们看到一些行记文本内容单纯,表达也相当简洁,这可以说是行记文体单一性的突出体现。但与这种单一性相伴的,是其丰富性和杂多性,它在文体中可以汇集各种元素,可能是日记体,也可能是散记体,还可能是报告体;它可以有散文式的片段描写或抒情,可以引入小说式的情节或故事,可以直接存储诗情(甚至是古体诗词),也可以发表各种感慨和议论;它既可以是各种实际的调查报告和科学勘测,也可以是民族文化的描写,也可以是地方民歌、方言

的记录和采撷。写实是行记文体的基本特质,但这并不妨碍其在此基础上传情达意,进而升华到更高的审美境界。

我们过去说风格的形成是作家成熟的标志,这不仅指作家创作和审美表达上的稳定性,还意味着这种审美表达的深刻性和透彻性,即作家能够有效克服创作中的生僻与异质的成分,将整个文学的肌理熔铸为生气灌注的审美统一体。这一规律,对虚构的审美文体来说是这样,对偏向写实的实用性文体也是如此。如果说,审美风格是更高的审美统一体,那么,我们前面说的杂多性也会终将统一于这种审美的单一性。当然,不同作品的审美统一性会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并且,这种审美的统一性也存在着实现程度上的差别。像《辛卯侍行记》这样的作品,其突出的特征就是旁征博引,显示出历史的厚重感。《西行日记》(陈万里)一路上对曲艺、方言情情有独钟,体现出浓厚的民间俚俗趣味。相对而言,《河海昆仑录》《中国的西北角》则体现出鲜明的创作特征,堪称同类书写的经典性作品。《河海昆仑录》可谓逆境中的抒愤之作。所谓逆境,不仅有个人仕途的波折,更有作者对一个时代即将巨变的预感。作者认为,中国面临的局势不是一朝一代的阵势之变,而是2000余年来的根本之变。他说:“以今日国本国势而论,无所谓新也,但去故而已。中国之故,非二百余年之故,乃二千余年之故也。”(裴景福,2016:105)作为儒林学子,作者讲究克己修身的功夫,即便如此,耿直与率性之情有时也难以抑制地喷薄而出。有此胸襟、情怀,便有与之相呼应的人物,柳子厚、苏东坡不仅因仕途坎坷而被作者引为同道,更因为类似的异域贬谪经历让作者倍感亲切。而真正到了“沙碛荒坡,人烟断绝”之处,杜甫的诗句“吹角向月窟,苍山旌旆愁。鸟惊出死树,龙怒拔老湫。古来无人境,今代横戈矛。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不期然飘然而出。此情此景,作者不禁感慨:“真为余写照也。”如果说《河海昆仑录》是充满郁愤的表达,那么,《中国的西北角》则是饱含忧患之作。这部作品曾被认为是最早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向外部世界报道红军在西北活动的文本。这自然也是作品的一种价值所在,但通读全篇便不难发现,作品的重心主要是对西北情势,尤其是其中(各)民族状况的贴近式书写,而且是典型的行记式表达。作品表达了对中华各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深切忧思。这种现实意识在作品中至为明显,但作品却并不停留于此一层面,往往是把民族问题、时势问题和人生问题结合在一起,而且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自然的深入。这就说明,作者在感知现实问题时已包含深刻的人生关切,由此延伸的民族平等意识,亦包含着巨大的人道情怀。这种忧患与关切不仅使作品富于情感色彩和精神气质,也使得作品在常规的写实层面得以升华,体现出一种明快与沉重相结合的审美格调。

3. 边疆行记可为边地文学敞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边疆行记以行程记的方式展开,换句话说,这也是边疆地理空间被逐步打开的过程。伴随边疆地理空间展开的,并不是纯粹的自然地理景观,而是丰富的社会人文内涵,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文化语义,涵盖政治、伦理、宗教、民族等复杂成分。边疆行记的展开过程联结于不同的空间形态,其实也意味着不同的语义内涵的表达。比如说,受特定的地域观、民族观、文化观的影响,古代边疆行记在整体语义上往往带有王制宣化、异闻进呈的色彩。这是与天下王朝的政治制度以及华夷之辨的文化观念相联系的。以这样宏观的视野来审视近现代边疆行记及与此相关的地理空间,则会发现其空间语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传统“天下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民族的交往、文化的摩荡都以更为深刻的形式渗透、影响着边疆地理空间的感知和表达。这自然也带来边疆行记语义内涵的深刻递嬗,我们在其中所感受的即时性与过往性、在场性与不在场性、单一性与杂多性的关联,实际上就是这种语义内涵趋向丰富复杂的表现,而不断膨化的文体样式则是这种丰富复杂语义内涵的形式凝结。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古今边疆行记的变化或许比较宏观一些;而如果从行记主体的角度来看,则显得更为贴近、具体,由此可见,近现代边疆行记的主体表达愈益趋向活跃。从近现代边疆行记书写主体出发,可以看到更丰富的现实社会关系、更生动的现实人生体验,它们都伴随着行记过程得到或隐或显的体现。当然,空间语义与主体意识是一体二面:一方面,行记主体感知空间语义的历史性变迁,领会这一演变过程可能催生的语义内涵;另一方面,空间语义也通过行记主体寻找更具体可感、更具人生意味的表达方式。

当行记主体内在感受在行记书写中得以充分表达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中国的西北角》《南行记》这样的散文随笔或散文式小说。但毫无疑问,归结于行记主体的不仅是对边疆世界的感官经验,更重要的是对这种经验的新理解和新体验方式。前面提及的《中国的西北角》对藏族女性自然美与野性美的描写,以及艾芜《山峡中》中对野猫子、魏大爷等让人又爱又怕的人物充满野性的生命形态的书写——这并非简单的直接经验记录,同样依赖于深广的文化理解和审美观念的更迭。

说到这里,我们基本没有离开边疆行记这一具体的文体样式。然而,由边疆行记扩展视野走进边地世界,则有望为边地文学创作敞开一个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当然,这需要超越个人经验而触及更丰富的边地生活形式,需要激活承载地域文化传统的特定艺术样式,在各种艺术元素的互动中实现审美意蕴的深化、审美格调的升华,创作出更富民族艺术神采的艺术作品。

参考文献:

- 陈万里,2021. 江山万里[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 范长江,1980. 中国的西北角[M]. 北京:新华出版社.
- 黄文弼,2024. 蒙新考察日记[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 李德辉,2003. 论中国古行记的基本特征[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 32-35.
- 鲁迅,1981. 鲁迅全集:卷 4[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裴景福,2016. 河海昆仑录[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钱谷融,1986. 当代作家国外游记选[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谢彬,2016. 新疆游记[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Semantic Connotations of the Modern Borderland Travel Accounts Zhao Shunhong Sun Jiahui

Abstract: 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concepts, the modern borderland travel accounts has been an important literary phenomenon that has been neglected. Re-examining and re-understanding this literary phenomenon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grasp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particular literary genre, and the change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but also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its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semantic connota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mperor’s domain” to the “nation-state”, 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oup-individ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state” within it. Furthermore, it can enhance our comprehension of the aesthetic occurrence of borderland literature.

Keywords: Borderland Travel Accounts;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semantic connotation

作者简介:

赵顺宏,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乡土小说、华文文学、边地文学研究。

孙嘉慧,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边地文学研究。